



公益与转型丛书

社区归来

——一个珠三角村庄的公共生活与社区再造

李翠玲◇著



公益与转型丛书

社区归来

——一个珠三角村庄的公共生活与社区再造

李翠玲◇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区归来：一个珠三角村庄的公共生活与社区再造 / 李翠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

ISBN 978 - 7 - 5161 - 6170 - 8

I. ①社… II. ①李… III. ①农村社区—社区建设—研究—广东省
IV. ①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733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胡新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5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55.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到以下课题资助：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研究”（12AZD027）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社会转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12&ZD00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公共生活与农民市民化的社会文化机制研究”（14CSH022）
的阶段性成果



《公益与转型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朱健刚

编委会成员	梁庆寅	陈春声	颜光美	蔡 禾
	徐信忠	陈少明	郭巍青	刘志伟
	程美宝	王燕鸣	邓启耀	周大鸣
	张和清	吴重庆	李汉荣	刘小钢
	朱健刚	赖建雄	倪 星	

总 序

公益转型推动社会转型

朱健刚

在经历了 30 多年经济体制转型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结构急需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也急需政府和公民之间能够良性互动，防止矛盾的暴力化倾向，形成理性的公民秩序。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公民公益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未来之中国能否超越传统的革命与改良二元论，以社会力量促使体制变革，从而能够既化解暴力冲突，又实现社会转型？这是我们研究和关注的重要命题。为此，我们诚邀一批行动导向的学者，共同编辑“公益与转型”学术丛书，我们的作者从理论思考和社会实践切入，共同观察当前的公益转型如何促成社会转型，又共同研究社会建设理念如何推动治理变革。在转型时代共同见证和推动国家的善治。

所谓公益转型，也是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的转型。其中从计划慈善体制缝隙中顽强生长出的民间公益最值得关注。在过去的 30 年间，中国的慈善体制长期处于计划体制的阴影中，大部分慈善行为仍然是政府主导，指令摊派，而且慈善行为也常常被过度政治化，这种计划慈善和市场经济已经格格不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吁国家在保障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同时，要让慈善事业回归民间，激发民间慈善的活力，也应该由此改革相对应的社会治理体制。

市场经济推动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这也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仅

仅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公益。这种全民公益的实质就是公民公益，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这种行为方式与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不同是：首先，它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它是普通人自愿地不计报酬地实现自助、互助和他助；其次，它是公共的，而非个人的，作为公共行为，公民公益或者追求公共利益，或者展现公共价值；最后，它是公民性的，这种公民性体现在它试图超越以往国家主义的计划慈善和纯粹个人性的施舍行为，强调公益慈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是一种情感和价值的礼物交换。除此之外，公民公益还寻求共识，强调以政府、市场和社会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公民公益对于社会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公民公益可以给普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一条柔性理性的管道。公民公益是普通人个体面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和困难而志愿地去寻求方法加以解决的过程。这就使得作为日常生活之地的社区成为公民重要的参与空间。也只有社区的公共生活活跃起来，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公民公益的重要作用在于激活基层社区，为整个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积累社会资本，同时直接带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参与。

第二，公民公益还可以培育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社会体制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社会本身有能力自我组织，自我解决社会问题。当前社会组织中最能够迅速成长的就是各类公益慈善组织。人们在社区自愿参与的基础上，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很容易跨越社区，逐渐使自己的志愿行为制度化和规范化，这就形成各类专业性的公益组织。这些一线公益组织并不需要行政动员或者政府资源，就可以自我发展，还会逐渐形成整个公益组织的生态价值链条。包括直接服务的民间公益组织和提供资金资助的基金会，也包括国际机构、企业 CSR 和政府的购买服务部门，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创新逐渐会形成社会组织的一个自我循环的公益生态。

第三，公民公益还可以直接影响社会政策过程，直接推动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和传统慈善单纯的救助不同，公民公益还强调助人自助，也强调整个社会政策的完善。社会政策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民生和发展问题，其政策过程并非由政府单方面促成，而往往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公益倡导等方式来影响相关法规和社会政策的创新，促进受助群体权益的保障。因此，

公民公益也包含公益倡导的内容，通过公益人或公益组织对政府的表达、要求、沟通和对话，使得政府能够调整政策，改善制度，以满足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的善治。

第四，公民公益对社会体制改革最长远的推动是它能不断培育出积极公民。社会体制改革虽然关注制度的改革，但好的制度也需要好的公民来推动和实施，制度才能真正成为可以落实的制度。积极公民是指那些敢于积极担当社会责任的公民，从汶川到芦山，我们都能看到在公益慈善的行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公民。我们今天谈到很多的社会创新家，很多就拥有积极公民的精神。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可以以公民价值观为核心，进行资源整合和动员，推动各类公益慈善的行动。公民公益需要通过激活以往的中华公益慈善传统，需要改革当前的教育、传播和知识生产机制，通过这种改革，使得更多的积极公民从公益慈善事业中涌现出来。

社区参与、社会组织、改善治理和培育公民构成了公民公益推动社会转型的四种途径，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丰富和拓展各方面的研究。我们相信，社会转型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普通人的努力，虽然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公民，但从另一面看，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将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中国的转型正蕴藏于每个参与公益的普通人的转变之中。

目 录

导论	(1)
一 关键概念界定	(7)
二 理论综述	(12)
三 研究方法:都市田野工作的挑战	(25)
四 本书框架结构安排	(29)
 第一章 古村新貌:宁村概况	(31)
第一节 自然气候及地理位置	(31)
第二节 历史、行政沿革	(33)
第三节 经济结构	(37)
第四节 人口	(43)
第五节 村庄的代表性	(54)
 第二章 繁荣再现:社区公共生活的传统和现实	(61)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社区公共生活	(61)
第二节 集体化时期的社区公共生活	(75)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的社区公共生活	(85)
 第三章 地方节奏:社区公共生活的时间安排	(99)
第一节 社区传统时间观念	(102)
第二节 现代时间观念体系的确立	(111)
第三节 社区公共生活的时间安排	(119)

第四章 城乡融合:社区公共生活的空间安排	(127)
第一节 社区公共政治空间	(129)
第二节 社区仪式空间	(137)
第三节 休闲娱乐空间	(158)
第五章 政府、民间联动:社区公共生活的组织	(166)
第一节 社区公共生活的行政性组织	(167)
第二节 民间社团的公共生活组织	(175)
第三节 “老板”与公共生活组织	(184)
第六章 提升生活品质:社区公共生活参与	(197)
第一节 公共生活参与群体	(199)
第二节 公共生活参与意愿与动机	(213)
第三节 参与公共生活的影响	(226)
第七章 结论	(233)
第一节 社区再造如何可能	(233)
第二节 改头换面的社区	(242)
第三节 乡村都市化背景下的社区再造:现代性的反思	(247)
参考文献	(252)
后记	(266)

导 论

在从事田野调查期间，很多当地居民都问过我，为什么会来到他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研究他们，他们有什么可研究的。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在田野工作过程中，我也多次扪心自问。的确，起初我不是冲着宁村去的，我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不过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最终将我牵引到了这个叫宁村的社区。按照最初的设想，我刚开始到小榄的时候，是打算研究这里颇具特色的一项民俗——菊花会的。2009年的夏天，我在小榄镇地方志办公室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宁村”两个字不断跃入眼帘：小榄“首富”，远近闻名的“亿元村”，乡村工业化、都市化的“样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最为先进的村庄……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福利，这个村庄都是耀眼的“先进典型”，任何小榄镇的重大事务，宁村都是最积极、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在前期走访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从当地居民口中听到宁村的大名，无一例外地流露出对这个村庄强烈的羡慕与向往。这些记载和描述逐渐使我对这个村庄产生了兴趣，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之前我对这个村庄毫不知情，也没有任何熟人朋友介绍，凭借一副“闯荡”田野的无畏气概，我带着一封学校的介绍信，从满街飞驰的“摩的”中截下一辆，不到10分钟就被带到了宁村居委会。这座大院楼宇森严，秩序井然，气派非凡：正对大门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有着深蓝色玻璃幕墙的大楼，在阳光照射下通体泛着冷峻的幽光，颇具现代气息；院子右侧是一个“服务大厅”，无论是面积、设施、办公方式，还是人员做派，都让人恍若置身于广州的某个街道办事处。上前向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来意，年轻人对此并不知情，但他马上询问其他同事，打电话帮我联系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去没一会儿，我就接到他打来的电话，问我找到了地方没。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周到与关切，令我十分感动。后来在居委会下属

的一个部门，由于部门负责人出差，另一名年轻人接待了我。他对菊花会的传统渊源知道得不多，菊花会也不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因此我们并未就此过多交谈。他对我的到访很热心，建议我去找他们的村书记，还给了我书记的电话号码。初次接触，我对这个村庄留下的印象很好，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很热情，跟一般发达地区本地人的冷漠、戒备、傲慢很不一样。不过，我真正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始于半年之后。

2010年1月，我又一次前往宁村进行短暂访问。几天之后，我有幸受到邀请，去参加居委会政工办公室组织的“社区文体总结表彰大会”。听了主管政工的郭书记的介绍，得知众多文体社团在这一年中的出色表现——健身队、拔河队、粤剧团、歌舞团、龙狮武术团、书画协会……我才发现原来这里的文体活动如此繁荣，群众团体如此众多，取得的成就如此显著！这个社区的拔河队居然要代表中国去意大利参加一个国际拔河比赛！来参会的基本都是受表彰的团体和个人，好些穿着运动服，看上去个个精神饱满，英姿勃发，令人感到非常振奋。会议结束后是晚宴，来吃饭的人比开会的更多，偌大的宴会厅中座无虚席，席间觥筹交错，洋溢着欢声笑语。在这个社区，这样的集体聚餐在年底非常密集，居委会各个部门——环卫、治保、物业、城建都会组织各自的年终总结聚会活动。对于我们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这一代人来说，火热的集体生活只是书本中的描述或长辈们充满感情的回忆。然而，在宁村，这种激动人心的生活场景却在重新变得鲜活，这里的人们如今就是在这样生活！调查期间，这个地方、这群人对我触动最大的地方，就是他们竭力营造共同体，将自己归属于群体生活的那种努力。

每个家庭都有着以血亲和姻亲为底色的社会关系网。此外，同学、同事、生意伙伴等友缘和业缘关系也在关系网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关系与家庭的财富、地位、声望相互作用，是当地人获取各种资源最主要的渠道。这些灵敏的关系网触角伸向四面八方，牢牢托起当地人的生活，使之在自己的“地盘”上生活得泰然自若、游刃有余。红白喜事是展示、扩大和加强家庭关系网的大好时机，促使人们不惜重金，在这些人生礼仪中大肆铺张，广泛宴请四方宾朋。

人们与祖先的关系强烈而紧密，每个家庭都在客厅中央郑重地供奉着祖先牌位，凡家庭重要事务必向祖先汇报请示，请求祖先保佑。社区墓地坐落于村西北的一座小山岗上，可以很容易地前去拜访探望故去的亲人先

祖。清明祭祖是一年一度与祖先团聚的大日子，受到各个家庭的高度重视。在墓地中选择一块风水宝地被认为对家族的繁荣昌盛至关重要，以至于尚还健在的人们也都急急忙忙去抢占一方墓穴，虚位以待。除了在各种仪式活动中与历代先祖保持紧密联系，人们还热衷于修订族谱，仔细厘清本宗本族的支系脉络，在将自己归入某姓某房某支的同时，发掘与自己源出一族的同胞，联络往来，一同去到周边市镇甚至省外寻根问祖。同一姓氏集团之间的男性成员相互称兄道弟，提到他们的“兄弟”时那种亲密无间的微笑和语气，十分令人生羡。

这里仍旧是一个有“神”社区，家家户户客厅都有观音、北帝、天后等数位大神坐镇，门口有土地神把守门户，厨房有灶神保佑食物充足、滋味甘美。乔迁新居的头等大事就是安放好神位，郑重祭拜，不如此不足以安居。拜神也是婚礼中的一道重要程序，新郎新娘必须悉数拜过双方家庭中的诸神，才能完成嫁娶，展开小家庭的新生活。家神之外属于社区神的管辖范围：村中遍布社坛，“社头”被视为“那边”的村长，掌管辖区范围内大小事务，受到当地居民普遍供奉；村里近年来还重建了大大小小数座庙宇，除了净意庵因为有在宗教管理部门的注册记录而得到大规模的公开重建外，其余都是人们私下自发重建的小庙。每个庙宇都有各自的信众和节日，香火普遍较为旺盛。

社区文化娱乐活动发达，活跃着健身队、拔河队、粤剧团、歌舞团、龙狮武术团、书画协会等众多群众文体社团，每个月几乎都会举行一场文艺演出，放上一两场电影。寒暑假期间，有专门为孩子们举办的篮球赛、少儿才艺大赛、游园会等活动。村里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全村性的健身操比赛、舞蹈比赛、拔河比赛和环村长跑。每当夜幕降临，许多妇女就会聚集到广场上，随着欢快的音乐集体起舞。年轻人在旁边的运动场打篮球、乒乓球或羽毛球，孩子们踩着滑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玩耍嬉戏。另外一些粤曲爱好者聚集在街巷或幽静古朴的“佩兰书室”，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村里还会举行一些大规模的集体宴饮，每年的重阳节，村里都会集体宴请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年底的聚餐活动也非常频繁，村政府各个职能部门都会召开各自的总结表彰大会，会后的聚餐无疑是活动的重头戏。

在对这个村庄的调查过程中，我似乎慢慢体会到，人们为什么要说“宁村好”。一方面，这个村庄有着异常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为村民提

供“从摇篮到坟墓”的良好福利；另一方面，经济的发达并没有摧毁这个村庄的社区生活，反而既促成了“传统复兴”，又为现代都市文化的引入提供了条件，使社区成员得以尽情享受集体生活的美好愉快。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生活富足和社区归属感，在这个正在经历工业化和都市化转型的村庄并行不悖，使之充满别具一格的魅力。

宁村生机蓬勃的社区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种现象并非宁村独有，许多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广东和浙江都出现了“社区生活的回归”和传统复兴的倾向，这类村庄“不仅经济迅速发展了，而且富有地方文化的韵味”^①。根据一般的认识和理解，工业化和都市化将导致农民和村落的终结，一方面在城市社会中，血缘纽带、邻里关系、世代生活受同一民俗传统影响等形成的情感荡然无存或极大减弱，竞争和正式的控制机制代替了民俗社会赖以存在的坚实纽带^②；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制度设置和精神要素，在各种细节上都与村庄的运行传统、结构、制度处于不同轨道，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自我维系和自我再生产的共同体，位居需要加以熔化（瓦解）的固体物（传统）名单的榜首”，迫使个人脱离共同体，凝结为“劳动的大众”^③。然而，为什么在宁村这类社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并没有完全服从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运行逻辑，变得高度理性、紧张、个人化，反而人们愿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组织参与各种与生产及利益无关的仪式和娱乐活动，致力于追求社区团结和集体生活？

我注意到，这些村庄表现出一些显著的共同点：经济发达，工业化、城镇化程度高，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进程中。这些因素与社区回归之间有何关系？为什么在农民和村落终结的地方，反而更容易出现社区回归？社区回归对这些地区意味着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本书调查和写作的始终。

① 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② [美] 路易·沃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载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9页。

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时期,各地乡村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一进程之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随着大城市扩张导致“城市带”的出现,以及乡村工业化带来的乡村“自然城镇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理、社会文化边界日益模糊,农民的终结和乡村的终结成为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然而,很少有人讨论过,农民和乡村在终结之后要往何处去。部分学者注意到,农民并不像通常所预期的那样张开双臂迎接都市化的到来,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民,他们对“跳农门”表现出顽强的反抗和抵制。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凭借对农民社会的深入研究预言,认为乡村社会和乡下人将来将会变得和大城市的情况一样,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幻想,农业劳动者和农村居民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将是有别于城市人的。^①美国学者高斯密则指出,(乡村)在都市化的进程中积极的一面并没有超过消极的一面——社区共同体的感觉和传统生活的社会团结消失了,代之以一种传统的没有个性的都市社会互动模式。^②乡村都市化是否就一定以社区共同体的衰落为代价?有没有可能在都市化的背景下保持社会团结和带有人情味的社会互动?如果有,这种带有乡村和都市混杂特质的社区和社区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重大社会问题,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思考。

另外,社会转型导致的社区解体对既有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并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张思指出,近20年来,中国农村在非集体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私·个人”的一面极度膨胀和“公·集团”的一面退化萎缩的不平衡现象,不但导致共同致富无望,稳定有序的共同管理也出现困难。^③阎云翔的观察更是充满悲观色彩,他认为走出祖荫的个人并没有获得独立自主的个性,而是表现出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义务,在公共领域表现自私。^④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积极培育与新型的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公·集团”的观念和习惯,已经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① [法]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美] 高斯密:《农民的终结》,《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16—19页。

③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④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时期,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导致以往的社会组织结构方式大面积失效,城市单位社会解体,农村基层社会陷入“原子化”困境,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整合替代方案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社区”所具有的行政管理单位和生活共同体的双重含义,使之成为追求稳定、秩序和满足人的需求的不二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下,“社区建设”首先在城市大规模展开。进入21世纪后,这一社会运动向农村蔓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农村建设”浪潮。这些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往往被视为“新农村建设”典范,这些村庄的发展道路,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乡村未来的发展。

本书试图阐明:在都市化变迁的进程中,社区共同体、村落传统生活和社会团结并不一定会消失,在现代条件下,社区公共生活能够得以存续,甚至更积极地复兴,社区共同体也将随之重获生机。需要指出的是:(1)当前的村落社区是经过改造和调适的共同体,传统村落社会在向都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也在发生相应变化,从以往依靠强关系维系的机械团结向以弱关系为基调的有机团结转变;(2)当前的村落社区是被生产和建构出来的。鲍曼指出,所有的共同体都是假定的,是在个体选择之后而非个体选择之前,是计划的东西而非现实的东西。^①折晓叶等提出,社区回归“不是传统社区形貌的简单再现,而是一个创造性地利用传统社区的社会性资源,再组织社区生活的过程;也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一个创造和重新建构的过程”^②。本书认为,共同体在变迁中表现出的表面上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实际是经过动员和再生产的结果。当地民众对社区共同体的追求,可以视为对当下快速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人们借助共同体的稳定性和归属感抵御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全面入侵。只有将社区共同体置于更为广阔的时代和区域背景中,才能理解这种共同体产生的文化策略。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3页。

② 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一 关键概念界定

(一) 社区

“社区”概念从提出至今，已经发展出上百种以上的定义。鉴于本书研究主旨和田野调查点具体情况，本书将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界定和把握“社区”概念：

1. 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区

从词源上来看，“社区”（community）的英文词根来自拉丁文 *communis*，其含义等同于共同安全和伙伴关系。^① 将“社区”引入社会学研究视野，则要归功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他的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奠定了“社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滕尼斯所指的“社区”，主要是一种相对于“社会”的组织类型，这些社会组织是由“本质意志”所导致的、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的、联系紧密的、富有人情味的小规模生活共同体。在他看来，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②

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区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最美好的生活理想之一，也是当前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费孝通指出，只有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和情感，才能为居民之间达成共识提供条件，促使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社区自治才能实现^③，因此，“社区秩序的关键，社区建设的归宿，都在于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与逐步强化”^④。作为共同体的社区生活理想还与儒家文化价值观高度一致，具有深厚的传统思

① 朱健刚：《国家、权力与街区空间》（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第26期，第171—193页。

② [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③ 费孝通：《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6页。

④ 马西恒：《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87—91页。